

供需条件与文化导向如何促进创业的“质”与“量”？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研究^{*}

□ 郭 翠 张 振 宋丽红

领域编辑推荐语：

“这篇文章基于复杂性视角，认为创业活动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本文采用 fsQCA 方法从宏观层面探究了需求侧、供给侧和文化三大类别中的六个条件对国家创业质量和创业活跃度的复杂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对于揭示创业活动的多元驱动路径具有启发。”

——杜运周

摘 要：创业活动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现有文献对创业活跃度进行了丰富的研究，而对创业质量的关注相对较少，更是缺乏对两者驱动机制的关联性分析。本文以 2015~2017 年 GEM 数据库为基础构建的 32 个国家创业调查数据为样本，采用 fsQCA 方法探究了需求侧、供给侧和文化三大类别中的六个条件对国家创业质量和创业活跃度的复杂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产生高创业质量的驱动机制包含四种组态：支持文化型、供给型、需求-供给-文化匹配型以及全因素型；②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包含四种组态，进一步可归纳为三类：人力供给型、供给-文化匹配型、需求-供给-文化匹配型；③产生高创业活跃度和高创业质量的组态存在着差异性：即使在其他条件缺失的情况下，优质人力资本能产生高创业活跃度，但不足以激发高创业质量。只有在具有尊重和认可创业特征的高社会合意性社会，优质人力资本才能产生高创业质量。

关键词：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创业质量；创业活跃度；因果复杂性；组态视角

^{*} 本文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家族企业代际涉入模式与企业创新机制研究”（GD21CGL2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家族企业的多元制度逻辑与长期导向战略研究”（71972119）、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创业成长意愿的制度约束及缓解机制研究”（2016A030313073）、广东高校省级重大科研项目“潮汕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2020WCXTD022）、攀枝花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CSC202008440348）的资助。衷心感谢主编、编辑及多位匿名评审为本文提供的宝贵建议。感谢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后张明和同济大学博士程建青在 QCA 方法上的指导和建议。

一、引言

创业活动是塑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Bradley et al., 2021)。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国政府都相继制定了相关政策并且投入大量资源用于激发创业活动,以推动经济发展(赵都敏和李剑力,2011)。我国于2014年推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的创业政策,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大众的创业热情。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数据显示,我国反映创业质量的高成长创业指数从2014年的1.01跃升至2015年的3.51,在参与调查的6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三^①。然而,2015年后,我国高成长创业指数呈现下跌趋势,在2017年降至1.84,排名第12。类似地,自2015年至2017年,反映创业活跃度的早期创业指数(Total Early-Stag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EA)也处于下滑状态,从2015年的12.84降至2017年的9.87。这一系列数字均表明,虽然我国创业活动的“质”和“量”在全球经济体中仍相对处于中上游,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下滑趋势。在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期,研究如何提升我国创业活动的“质”与“量”对平稳就业、优化经济结构和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者们已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可以归纳为需求侧、供给

侧以及文化因素(Stephan & Uhlaner, 2010)。需求侧因素侧重于考察影响创业机会产生的因素,涵盖多种制度条件,如政府管制(Stenholm et al., 2013; Valdez & Richardson, 2013)、金融制度等(Levie & Autio, 2008; Nikolaev et al., 2018)。供给侧因素侧重于探究影响潜在创业者出现的因素,如人力资本(Boudreaux & Nikolaev, 2019)、创业合意性(Stephan & Uhlaner, 2010)。创业者参与创业活动并不是处于社会真空,而是发生于特定价值观和文化标准中,因此文化因素也是解释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胡汉辉等, 2020; 赵向阳等, 2012)。梳理创业文献可以发现,三类因素与创业活动的关系仍是众说纷纭。以创业质量为例,研究发现政府管制与创业质量可能正相关(Boudreaux & Nikolaev, 2019; Chowdhury et al., 2019)、负相关(Asoni & Sanandaji, 2014)或无关(Levie & Autio, 2008; Stenholm et al., 2013)。创业活动是一种复杂现象,受到多种因素(如文化、制度等)的共同影响(程建青等, 2019; 杜运周等, 2020; 谢智敏等, 2020)。以往研究忽略了需求侧、供给侧和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难以得到一致的结论。因此,从整体视角剖析三类因素对创业活动的联动效应有助于深入理解创业活动(Douglas et al., 2020; 杜运周, 2019)。创业折衷理论(eclectic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将创业活动视为多种因素间的共同结果,不同因素之间并非孤立,而是存在相互影响,

^① GEM数据中,高成长创业指数具有多种测量方法,如:第一,新生创业者或新创企业所有者中预期五年内创造20个或更多工作岗位的个体占18~64岁工作人群的比例(Levie & Autio, 2008);第二,新生创业者或新创企业所有者中预期五年内创造20个或更多工作岗位的个体占新生创业者或新创企业所有者的比例。由于测量方法的不同,中国的排名情况也存在差异。此处数据为采用第一种方法计算所得。

为分析创业活动提供了涵盖需求侧、供给侧、文化等因素的整体性框架(Verheul et al., 2002)。因此,本文采用创业折衷理论分析多种因素间的联动作用。

虽然已有个别研究采用创业折衷理论,试图从整体性视角分析创业活动(Thai & Turkina, 2014),但是受传统研究方法的限制,在分析多种因素的联动效应上效力有限(伯努瓦·里豪克斯和查尔斯·C. 拉金, 2017)。而基于组态视角的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方法使探究多种因素的复杂互动和“组态效应”成为可能(杜运周和贾良定, 2017)。目前创业领域学者开始使用QCA方法研究创业活跃度(Wu et al., 2019; 程建青等, 2019; 杜运周等, 2020; 胡汉辉等, 2020; 徐广平等, 2020; 杨英等, 2021)或者创业质量的驱动机制(Devece et al., 2016; Douglas et al., 2020; Du & Kim, 2021; 谢智敏等, 2020)。梳理现有QCA研究发现,现有文献侧重于需求侧、供给侧与其他因素的联动效应,较少考量文化因素的作用。文化作为社会成员间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House et al., 2004),能直接塑造个体的创业行为(Hofstede, 1980),也能通过需求侧和供给侧因素间接地影响创业活动(Stephan & Uhlaner, 2010; Capelleras et al., 2019)。因此,将文化因素纳入分析有助于解释国家间创业活动的差异(胡汉辉等, 2020; 赵向阳等, 2012)。此外,现有QCA文献单独探究创业质量或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尚未综合分析创业质量与创业活跃度。如杜运周等(2020)基于生态系统视角,剖析了六种营商环境生态要素的耦合对我国城市创业活跃

度的影响。类似地,谢智敏等(2020)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探究了六种因素对创业质量的结果复杂机制。需要注意的是,创业质量和创业活跃度是创业活动的不同维度,影响创业活跃度的因素不一定影响创业质量。正如Stenholm等(2013)的研究所示,政府管制能够促进创业活跃度,但对创业质量没有显著作用。因此,综合剖析创业质量与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有助于深化对创业活动的理解,厘清创业质量和创业活跃度影响因素的差异(Chowdhury et al., 2019; 谢智敏等, 2020),有助于制定精准和有效的创业政策来提升创业质量,促进我国创业活动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上,本文聚焦于以下研究问题:第一,需求侧、供给侧与文化因素如何联动地产生高创业质量?第二,需求侧、供给侧与文化因素如何联动地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第三,产生高创业质量和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有何差异性?本文将在创业折衷理论的基础上,使用基于组态视角的fsQCA方法,并以2015~2017年GEM数据库与其他权威数据库匹配后的32个国家为样本,整合需求侧、供给侧、文化三类宏观因素,探究政府制度、金融可得性、创业合意性、人力资本、绩效性文化、支持性文化六个前因条件影响创业质量和创业活跃度的复杂因果机制。

本文的研究贡献具有三个方面:其一,本文运用QCA方法,整合了需求侧、供给侧和文化三大类别下六个条件分析创业活动的驱动机制,为以往研究结论不一致的现象提供了解释。其二,本文探究了包含文化因素在内的三类因素的联动效应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丰富了文化

视角的创业研究。其三,本文同时考察了创业活动“质”(创业质量)和“量”(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剖析了两者的差异性,增强了对创业活动的理论理解。本文对推进中国创业活动的发展有所启示,对促进我国创业活动有“质”、有“量”地健康发展的政策制定有所借鉴。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 理论基础

Verheul 等(2002)基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创业研究,整合了需求侧、供给侧、个人决策、创业均衡率和实际率、政府干预以及文化共六类微观和宏观因素,建构了分析创业活动的折衷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创业活动受到六类因素的共同影响,六类因素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例如,需求侧因素影响创业机会的产生,供给侧因素则影响利用创业机会的潜在创业者。此外,潜在创业者根据需求侧和供给侧因素,对参与创业或就业进行风险-回报评估,从而做出职业选择决策。潜在创业者的职业选择聚合到整体层次就形成了创业进入或退出率。创业活动发生于特定文化背景,而非处于社会真空,因此文化因素也影响着创业活动。与文化因素类似,政府干预也可以通过影响需求侧因素(如简化和透明的注册程序能够降低开办企业的难度,从而提高创业机会)和供给侧因素(如政府政策可以改变人力资本的可获得性)影响创业活动。综上所述,创业折衷理论认为创业活动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不同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作为一个整合性框架,折衷理论对各国家或地区创业活动的差异提供了系统和全面的视角,被现有的创业研究所采用。如 Thai 和 Turkina(2014)基于折衷理论,分析了需求侧、供给侧、文化、政府干预对正式创业和非正式创业的影响,同时分析了不同因素之间的影响。但是该理论还处于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学者对六类因素有着不同的解释。如 Stephan 和 Uhlaner(2010)研究了需求侧、供给侧、文化因素对创业活动的影响。该研究认为需求侧因素侧重于创业机会的产生,因此将政府干预(即制度因素)放入需求侧因素中。本文亦采取同样做法。此外,虽然折衷理论归纳了六类因素,但创业均衡和实际率是一种理论条件,因为缺乏可操作性的测量方法而在实证研究中被剔除(Thai & Turkina, 2014)。本文旨在分析创业活动的宏观层次因素,而个人决策类因素属于微观层次,因此未纳入考察范围。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折衷理论框架,分析需求侧、供给侧、文化因素如何影响创业活动。

创业活动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复杂现象,对创业活动的不同维度进行整合分析将有助于深化对创业活动的理解(赵向阳等,2012; Stephan & Uhlaner, 2010)。历年的 GEM 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具有较高的创业活跃度,而其创业质量较低。与之相反,发达国家的创业质量较高,但是创业活跃度较低(赵向阳等,2012)。这种现象表明,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是创业活动的两个不同的维度,不应该将他们视为一类。由于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的差异性,影响创业活跃度的因素不一定能够影响创

业质量。例如，政府管制有助于提高创业活跃度，而对创业质量没有显著影响（Stenholm et al.，2013）。然而，以往许多国家的创业政策没有清晰地区分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而默认为创业者是自动追求成长的，创业活动天生具有较高的质量（Autio，2005）。忽视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的差异性不利于对创业活动的全面理解（Davidsson & Wiklund，2000）。因此，区分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是有必要的。本文结合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进行综合分析，以深入理解创业活动现象，厘清创业质量和创业活跃度影响因素的差异。

（二）文献综述

1. 需求侧因素

需求侧因素涵盖多种制度因素（Thornton，1999；Wennekers et al.，2002），侧重于创业机会的产生，这些因素会因市场需求而衍生出创业机会，显著地影响创业活动（Stephan & Uhlaner，2010）。需求侧因素中，政府管制和金融制度对创业活动具有重要影响（Chowdhury et al.，2019；Levie & Autio，2008；Stenholm et al.，2013）。

（1）政府管制。政府管制是指政府为了促进创业活动、降低创业风险而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Reynolds et al.，2005）。创业活动处于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奇与复杂环境（Bradley et al.，2021；Du & Kim，2021；McMullen & Shepherd，2006），而政府管制作作为一种社会规则，可以为创业者经营企业和资产保护提供制度性保障，有效降低创业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剽窃等侵权行为）。此外，优良的政府管制也能体现出政府对新创企业较高的重视和

支持，有助于创业者获得所需资源，从而激励个体投身于创业活动，提高创业活跃度（王玲玲等，2017）。现有文献对政府管制与创业活跃度的关系进行了较丰富的研究，但并未达成一致。有些研究认为优良政府管制降低了创业者的市场进入成本，提高了政府运行和服务质量，从而坚定了个体投身于创业活动的信念，提高了创业活跃度（Stenholm et al.，2013；陈刚，2015；黄亮雄等，2020）；然而，有些研究发现即使面临着严格的政府管制（如繁杂的注册程序和较长的注册时间等），创造性的创业者能够想方设法避免或者克服这些障碍，因此政府管制对创业活跃度没有显著影响（Stel et al.，2007）。程建青等（2019）基于组态视角，发现政府管制与创业活跃度的关系是权变的，政府管制与规范制度、认知制度、创业意向和创业机会识别等因素协同影响创业活跃度。

政府管制与创业质量的关系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但是也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优良的政府管制可以降低创业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张龙鹏等，2016），使创业者将创业资源用于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等生产性活动，而不是游说等非生产性活动（Davidsson & Henrekson，2002；Sobel，2008）；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可以保障创业者的合法权益，鼓励创业者充分利用个人能力促进企业成长（Autio & Acs，2010；Chowdhury et al.，2019）。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创业者的创业积极性和创业热情（陈刚，2015；周蒨文，2015），有利于促进初创企业成长，提高企业绩效，从而产生高质量的创业活动（Boudreaux & Nikolaev，2019；黄亮雄等，

2020; 张龙鹏等, 2016)。尽管如此, 已有相关研究对政府管制与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并未达成一致。有些研究发现严格政府管制的环境中, 新创企业规模要大于宽松管制环境中的企业 (Capelleras et al., 2019), 政府管制越严格, 新创企业成长期望越高, 从而提升了创业质量 (Asoni & Sanandaji, 2014)。有些研究则认为当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时, 无论是否存在优良的政府管制, 创业者始终会保持创业热情和较高的创业成长期望, 因此政府管制与创业质量无显著的关联 (Bowen & Clercq, 2008; Levie & Autio, 2008; Stenholm et al., 2013; Valdez & Richardson, 2013)。

(2) 金融可得性。金融可得性是指创业者获得创业资金的便利程度 (Levie & Autio, 2008)。金融资源对企业的创建、成长等各个阶段具有重要影响 (Gompers et al., 2005; Levie & Autio, 2008)。由于新进入劣势, 新创企业需要充足的金融资源来支持创业活动。在金融可得性高的国家, 潜在创业个体面临着较低的金融约束和融资成本, 更容易获得开创企业所需的金融资源, 从而鼓舞潜在创业个体参与创业, 因此金融可得性能够提高创业活跃度 (Lim et al., 2010; 卢亚娟等, 2014)。然而, 金融可得性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并不总是正向的。金融可得性可能对创业活跃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Chowdhury et al., 2015), 甚至存在负向影响 (周清杰和张志芳, 2020)。在金融制度完善和金融支持力度大的地区, 虽然潜在创业群体可以更加容易获得金融支持, 但是更可能认为创业者需要更高的个人综合能力。因此, 潜在创业群体可能拥有较低的创业热情,

从而降低创业活跃度 (周清杰和张志芳, 2020)。近来研究发现, 金融可得性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不是固定的, 金融可得性与其他因素协同影响创业活跃度 (杜运周等, 2020; 杨英等, 2021)。例如, 杜运周等 (2020) 发现金融因素与人力资源、政府效率、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创新环境等因素协同影响创业活跃度。

虽然互联网金融大大降低了新创企业融资的门槛, 但是初创企业的发展和成长仍然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源支持 (Hurst & Lusardi, 2004)。完善的金融制度能够保证创业者便利地获得所需的金融资源, 以支持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等活动, 从而提升创业质量 (Sobel, 2008)。金融可得性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 但对金融可得性和创业质量的关系并未达成一致 (Chowdhury et al., 2019; Levie & Autio, 2008; Stenholm et al., 2013; 谢智敏等, 2020)。部分研究表明完善的金融制度有利于提高融资便利度, 减少融资约束 (Blanchflower & Oswald, 1998; Lindh & Ohlsson, 1996), 保证创业者获取所需的金融支持, 从而提高创业质量 (Bowen & Clercq, 2008; Chowdhury et al., 2019; Stenholm et al., 2013)。但是有些研究发现金融资源并不是创业质量的显著影响因素 (Levie & Autio, 2008), 尤其是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 金融资源对高质量创业活动的影响会降低 (Boudreaux & Nikolaev, 2018)。谢智敏等 (2020) 也发现金融资源会与市场规模、人力资本、硬件设施、互联网、政府规模等因素协同影响创业质量, 金融资源对创业质量的作用并不是固定的。

2. 供给侧因素

供给侧因素侧重于探究影响潜在创业者出现的因素，包括微观层次因素（如个体能力和态度）和宏观层次因素（如创业合意性和人力资本）。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创业合意性和人力资本对创业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Boudreaux & Nikolaev, 2019; Capelleras et al., 2019; Chowdhury et al., 2019; Stephan & Uhlaner, 2010）。

（1）创业合意性。创业合意性是指社会公众有关创业活动的地位和回报的主观规范和普遍看法（Koellinger, 2008; Muralidharan & Pathak, 2017; Stephan & Uhlaner, 2010）。在创业合意性较高的社会，创业者可以得到足够的社会尊重和认可，社会大众将创业视为一种良好的职业选择。这种支持创业的环境氛围能够提高潜在创业群体的自我效能感，有助于潜在创业群体识别创业机会和获取更丰富的创业资源，从而提升创业活跃度（程建青等，2019）。此外，在认可和尊重创业的社会，成功的创业者会成为榜样，潜在创业群体更可能参考创业榜样，模仿其职业选择，从而投身于创业活动（郑馨等，2017）。现有研究分析了创业合意性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但是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郑馨等（2017）基于 GEM 数据库中 62 个国家样本，发现创业合意性显著地促进创业活跃度。Stephan 和 Uhlaner（2010）也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些研究认为创业合意性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是单向的，即创业合意性越高，对创业活跃度的正向影响越强。然而，近年来研究发现创业合意性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程建青等，2019; 高伟等，2018; 杨英等，2021）。

例如，程建青等（2019）基于 25 个国家样本发现，尊重和认可创业的规范制度与管制制度、认知制度、创业意向和创业机会识别等因素协同影响创业活跃度。

现有研究也对创业合意性与创业质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尊重和认可创业活动的社会氛围中，个体的创业激情得以激发，获得更高的创业自我效能感，拥有更强的成功管理企业的信心（Kibler & Kautonen, 2016）。此外，尊重和认可创业的社会规范能够打破严格政府管制对创业活动的束缚（Cuervo, 2005），能够补充或替代政府管制、金融可得性等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李新春等，2016; 杨英等，2021; 郑馨等，2017）。创业者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来自公共机构、风险投资的金融资源（Autio et al., 2013）和创业相关的知识与信息（Muralidharan & Pathak, 2017; Stephan & Uhlaner, 2010），从而促进初创企业的成长，提升创业质量。现有研究对创业合意性与创业质量的关系也存在不一致结论。Stephan 和 Uhlaner（2010）基于 GEM 数据库中 40 个国家样本发现，创业合意性能够显著地提升创业质量，而 Stenholm 等（2013）认为创业合意性虽然能够鼓励个体积极参与创业，但是并不能促进新创企业的成长，不会影响创业质量。Capelleras 等（2019）得出了创业合意性不能显著地直接影响创业质量的结论，但是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合意性能够与创业经验交互地提升创业质量。

（2）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反映了国家教育体系的质量。良好的教育体系能够提高个体的知识和技能（Coleman, 1988），而与创业活动有关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对于创业成功具有重要

作用(杨英等, 2021)。通过高质量的创业教育体系, 潜在创业群体可以获得丰富的创业知识, 培养较高的创业技能和形成积极的创业态度 (Chowdhury et al., 2015)。这些能够促进潜在创业者产生更高的创业导向, 有助于潜在创业者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 鼓励潜在创业者开展创业活动(任胜钢等, 2017; 杨英等, 2021)。创业者往往不是单打独斗的, 他们也需要具有丰富知识和能力的人力资本。在拥有优质人力资本的国家, 潜在创业者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得人力资本的供给(杜运周等, 2020), 从而产生更强的创业信心, 提高创业活跃度。现有研究关于人力资本和创业活跃度的关系尚未达成一致。除了人力资本能够促进创业活跃度外 (Simoes et al., 2016; 任胜钢等, 2017), 有些研究认为人力资本不会对创业活跃度产生显著的影响 (Levie & Autio, 2008; Lim et al., 2010), 甚至发现人力资本会负向影响创业活跃度 (Chowdhury et al., 2015)。Chowdhury 等 (2015) 认为创业活动是有风险的, 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会觉得他们选择进入企业工作会比参与创业获得更高和更加稳定的回报, 因此, 人力资本会抑制创业活跃度。

人力资本不仅影响着创业活跃度, 也会影响创业质量。人力资本能够通过三个方面提升创业质量。首先, 教育能够提高个体的知识和技能 (Chowdhury et al., 2015; Coleman, 1988), 有助于创业者收集和分析相关信息, 了解市场和新技术, 从而更好地识别和利用提升企业成长的机会 (Clercq et al., 2014; Shane, 2000)。其次, 个体通过教育能够提高认知能力, 拥有更强的解决问题和决策能力, 从而更

好地适应复杂的环境 (Chandler & Hanks, 1994), 有利于初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DeTienne & Chandler, 2004)。最后, 受过高等教育的创业者往往拥有庞大的资源丰富的关系网络 (Capelleras et al., 2010), 更容易获得企业成长所需的资源, 从而促进新创企业的成长。因此, 人力资本能够提升创业质量 (Chowdhury et al., 2019; Giotopoulos et al., 2017; Ma & Todorovic, 2012)。然而, 其他创业研究提出了不一致的见解。教育水平高的创业者在就业市场上的选择更多, 投身创业时面临更高的机会成本 (Shane & Venkataraman, 2000)。此外, 拥有丰富创业知识和经验的创业者可能对创业具有更全面和现实的看法, 对新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前景具有较低的信心和期望 (Minniti et al., 2007), 因此人力资本会降低创业质量 (Capelleras et al., 2019)。以往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认为人力资本对创业质量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响, 而谢智敏等 (2020) 发现人力资本并非恒定不变地影响着创业质量, 其与市场规模、金融资本、硬件设施、互联网、政府规模等因素协同影响创业质量。

3. 文化因素

在文化与创业活动关系的研究中, GLOBE 数据库 (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al Effectiveness) 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可 (Pathak & Muralidharan, 2016; Thai & Turkina, 2014; Wennberg et al., 2013)。由于 GLOBE 数据库各个文化维度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并且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 采用综合性的文化概念比单独的文化维度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赵向阳等, 2012), 也在多项研究中得到应用

(Peterson & Castro, 2006; Stephan & Uhlaner, 2010; Thai & Turkina, 2014; 赵向阳等, 2012)。因此, 本文亦采用绩效性文化和支持性文化两种综合性构念, 并对以往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1) 绩效性文化。绩效性文化是 GLOBE 文化维度的聚合因素, 由绩效导向、不确定性规避、未来导向、小团体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聚合而成。绩效性文化是鼓励和追求个人成就的文化, 反映了社会鼓励和奖励创新与绩效改进的程度 (Hopp & Stephan, 2012; Stephan & Uhlaner, 2010)。在绩效性文化的社会, 个体追求个人成就, 实现个人目标。而创业本身就是一种绩效和成就导向的活动 (Rauch & Frese, 2007)。在创业活动中, 个体通过付出努力换取预期的回报。因此, 绩效性文化能够鼓励潜在创业者参与创业活动, 从而提升活跃度。现有研究对绩效性文化与创业活跃度的关系尚未达成一致。Hopp 和 Stephan (2012) 发现绩效性文化能够提高个体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动机, 从而促进创业活跃度。Thai 和 Turkina (2014) 研究了 52 个国家的创业活动, 也发现绩效性文化能够促进创业活跃度。然而, Stephan 和 Uhlaner (2010) 基于 GEM 数据库 40 个国家样本数据, 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绩效性文化会抑制创业活跃度。

绩效性文化也会影响创业质量。强调绩效性文化的社会鼓励创业者追求成功和远大的目标, 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 创业者能够对未来目标做出系统性的规划, 制定科学战略以实现目标 (Shane & Venkataraman, 2000)。在强调高成就导向的社会中, 创业者拥有更高的内在动机 (如个人成就需求), 这会增强创业者的成

长期期望 (Guzmán & Javier Santos, 2001)。即使经历失败和挫折, 创业者也更可能保持初心和耐心。此外, 绩效性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 有助于发展出相对完善的有利于企业成长的正式制度环境和丰富的金融、人力等资源 (赵向阳等, 2012)。因此, 绩效性文化有利于提升创业者成长意愿 (赵向阳等, 2012), 促进企业成长和发展, 提升创业质量 (Brinckmann et al., 2010; Rauch & Frese, 2007)。然而, 一些研究发现绩效性文化对创业质量没有显著影响 (Stephan & Uhlaner, 2010)。

(2) 支持性文化。支持性文化是 GLOBE 文化维度的聚合因素, 由人际关怀导向和恃强性两个维度聚合而成。支持性文化程度越高的社会越支持相互合作, 具有积极的人际关系和对失败更加宽容。这种对失败和错误容忍度高的社会, 有助于减少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担忧, 减轻因创业失败而承受的来自周围的压力 (Stephan & Uhlaner, 2010; 赵向阳等, 2012)。支持性文化能够增强潜在创业个体的自我效能感 (Choi & Chang, 2009), 鼓励个体勇于实践和试错, 从而激发创业活动。现有研究表明支持性文化能够促进创业活跃度。例如, Stephan 和 Uhlaner (2010) 基于 GEM 数据库 40 个国家样本数据, 发现支持性文化能够正向影响创业活跃度。Hopp 和 Stephan (2012) 进一步发现, 支持性文化能够提高个体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动机, 从而促进创业活跃度。然而, Thai 和 Turkina (2014) 发现支持性文化对创业活跃度没有显著影响。

支持性文化也会影响创业质量。积极的社会氛围会提升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 (Choi &

Chang, 2009),从而有助于增强创业者对创业成长的信心。创业活动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创业者的个人努力,也依赖来自于他人的支持(Stephan & Uhlaner, 2010; Thornton et al., 2011)。初创企业的成长离不开充足的资源支持,在鼓励合作的友好社会环境,创业者能够更加容易地从周围环境获得所需的信息、金融等资源支持(Davidsson & Honig, 2003; Muralidharan & Pathak, 2017),能够弥补金融制度不健全产生的不利影响。在宽容失败、尊重创业的社会,创业者将更倾向于具有冒险精神,积极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有利于初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然而,一些研究发现具有人际关怀特征的文化对创业质量没有显著影响(赵向阳等, 2012)。

基于以上文献梳理发现,需求侧因素(政府管制和金融可得性)、供给侧因素(创业合意性和人力资本)、文化因素(绩效性文化和支持性文化)与创业质量及创业活跃度之间的关系结论存在不一致。创业活动受到多种因素(如文化、制度等)的共同影响(程建青等, 2019; 杜运周等, 2020; 徐广平等, 2020; 郑馨等, 2017),需求侧、供给侧和文化不是独立地而是相互作用、联动地影响创业活动。因此,从整体视角探究三类因素对创业活动的联动效应具有重要意义(Douglas et al., 2020; 杜运周, 2019)。创业折衷理论为理解创业活动提供了整体性框架,将创业活动视为多种因素间的共同结果,有助于理解多种因素间的联动作用。鉴于此,本文采用创业折衷理论,使用基于组态视角的QCA方法,探究政府管制与金融可得性(需求侧因素)、创业合意性与人力资本(供给侧因素)、绩效性文化和支持性文化(文化导向)三个类别的六个条件影响创业质量和创业活跃度的复杂因果机制。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设计

基于影响创业活动的供需条件和文化导向的相关研究,本文使用fsQCA方法分析政府管制、金融可得性、创业合意性、人力资本、绩效性文化、支持性文化六个前因条件如何共同影响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QCA是一种“案例导向”式的研究方法。它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将结果看作条件的组态,与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聚焦于单个因素的独特“净效应”不同,QCA关注条件间的“联动效应”(Rihoux & Ragin, 2008; 杜运周和贾良定, 2017)。此外,QCA关注跨案例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即不同的前因条件组态能够引起相同的结果(杜运周和贾良定, 2017)。创业活动是一个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多层次因素的复杂过程,受到多种因素(如经济水平、社会文化、制度因素、资源因素等)的共同影响(宋丽红等, 2015; 赵向阳等, 2012)。因此,QCA方法的整体性和组态视角非常适合分析创业活动的多重影响因素。

(二) 样本和数据

本文选取的样本来源于全球创业观察(GEM)数据库,此调查覆盖面广、持续性强,已广泛应用于创业研究中(Stephan & Uhlaner, 2010; 赵向阳等, 2012)。由于创业活动存在一定的年度波动性,本文选用最新可得的2015~2017年三次调查数据的均值,以反映各个国家创业活动的平均水平。本文还整合了其他权威数据库以构建最终样本:国家创业活动、金融可得性、人力资本、创业合意性数据来源于2015~2017年的全球创业观察(GEM)数据库;

匹配以上研究时段的政府管制数据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发布的 2016~2018 年经济自由度报告^①；绩效性文化和支持

性文化的数据来自 2004 年的 GLOBE 数据库^②。经过对各数据库的样本进行匹配，最终 32 个国家进入分析范围，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文案例的基本信息

研究案例	所属地区	人口（百万）	GDP（十亿美元）	人均 GDP（美元）	全球竞争力排名
阿根廷	美洲	44.04	643.63	14613.04	81/140
巴西		207.83	2062.83	9925.39	72/140
加拿大		36.55	1649.88	45146.11	12/140
哥伦比亚		48.91	311.88	6376.71	60/140
厄瓜多尔		16.79	104.30	6213.50	86/140
危地马拉		16.09	71.61	4451.45	96/140
墨西哥		124.78	1158.91	9287.85	46/140
美国		324.99	19519.35	60062.22	1/140
爱尔兰	欧洲	481.00	335.66	69822.35	23/140
德国		82.66	3682.60	44552.82	3/140
希腊		10.75	203.59	18930.22	57/140
意大利		60.54	1961.80	32406.72	31/140
荷兰		17.13	833.87	48675.22	6/140
波兰		37.97	526.51	13864.68	37/140
斯洛文尼亚		2.07	48.59	23512.82	35/140
西班牙		46.59	1312.54	28170.17	26/140
瑞典		10.06	541.02	53791.51	9/140
瑞士		8.45	679.95	80449.99	4/140
英国		66.06	2666.23	40361.42	8/140
澳大利亚	大洋洲	24.60	1329.19	54027.97	14/140
南非	非洲	57.01	349.55	6131.48	67/140
摩洛哥		35.58	109.68	3036.33	75/140
埃及		96.44	235.73	2444.29	94/140
中国	亚洲	1386.40	12310.41	8879.44	28/140
韩国		51.36	1623.90	31616.84	15/140
印度		1338.66	2652.75	1981.65	58/140
印度尼西亚		264.65	1015.62	3837.65	45/140
伊朗		80.67	445.35	5520.31	89/140
以色列		8.71	353.25	40541.86	20/140
哈萨克斯坦		18.04	166.81	9247.58	59/140
马来西亚		31.11	319.11	10259.18	25/140
泰国		69.21	456.29	6592.91	38/140

注：人口、GDP、人均 GDP 及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排名指标皆来源于 2017 年数据。

① 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http://www.heritage.org>）每年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报告的数据范围涉及前年下半年至上一年上半年，如 2018 年经济自由度报告数据涉及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为了尽可能与本文选择的时间段（2015~2017 年）数据相匹配，本文选择 2016~2018 年经济自由度报告，数据范围涉及 2014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

② 2004 年 GLOBE 文化调查（<https://globeproject.com/>）是目前可获得的最新数据。虽然距今已经 17 年，但是由于国家文化是非常稳定的，短时间内难以发生剧烈变化，该数据仍然被国内外学者所使用（赵向阳等，2012；Schmutzler et al.，2019）。

(三) 测量和校准

本文各研究结果和条件数据来源于 GEM 数

据库、美国传统基金会和 GLOBE 数据库，原始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案例样本原始数据^①

研究案例	条件						结果	
	需求侧		供给侧		文化			
	政府 管制	金融 可得性	创业 合意性 ^②	人力 资本	绩效性 文化	支持性 文化	创业 活跃度	创业 质量
阿根廷	42.96	1.89	56.37	2.40	3.05	3.89	12.74	0.88
澳大利亚	86.37	2.59	66.17	2.20	3.99	4.00	13.19	1.62
巴西	56.19	2.53	75.78	1.91	3.39	3.73	20.28	0.25
加拿大	85.22	2.97	71.27	2.67	4.08	4.22	16.73	2.28
中国	46.34	3.19	73.35	2.47	3.66	4.30	11.00	2.53
哥伦比亚	68.06	2.10	67.47	2.61	3.10	3.76	22.90	3.95
厄瓜多尔	42.81	1.93	65.44	2.84	3.24	4.28	31.67	0.38
埃及	49.12	2.31	74.54	1.54	3.53	4.41	11.65	1.23
德国	86.10	2.79	59.58	2.10	3.96	3.32	4.85	0.60
希腊	61.22	1.97	56.44	2.22	3.07	3.38	5.76	0.15
危地马拉	47.31	1.70	77.08	2.33	3.02	4.00	20.84	0.77
印度	53.76	3.30	45.56	2.67	3.44	4.42	10.23	0.22
印度尼西亚	48.00	3.13	77.26	3.16	3.52	4.41	13.07	0.12
伊朗	43.89	1.83	62.75	1.83	3.30	4.09	13.01	1.81
爱尔兰	84.20	2.91	68.89	2.43	3.67	4.52	9.71	1.50
以色列	72.90	3.03	68.40	2.31	3.70	3.94	11.97	1.34
意大利	67.70	2.40	61.77	2.26	3.25	3.78	4.52	0.17
哈萨克斯坦	60.54	2.63	73.43	2.27	3.25	3.77	10.82	1.41
马来西亚	81.70	3.37	59.44	2.68	3.80	4.50	9.74	0.38
墨西哥	62.60	2.50	48.38	2.54	3.44	3.76	14.92	0.28
摩洛哥	58.75	2.25	62.32	1.78	3.05	3.84	6.25	0.18
荷兰	84.33	3.46	67.61	3.38	4.36	3.77	9.37	0.64
波兰	65.22	2.91	60.11	1.96	3.20	3.77	9.57	0.92
斯洛文尼亚	75.62	2.54	64.10	2.23	3.25	3.90	6.93	0.56
南非	63.69	2.51	73.78	2.16	3.94	3.72	9.02	1.00
韩国	83.27	2.38	55.85	2.10	3.39	3.71	9.64	0.70
西班牙	70.59	2.43	50.56	2.20	3.30	3.45	5.71	0.22
瑞典	90.16	2.80	62.01	2.45	4.18	4.36	7.34	0.37
瑞士	82.64	3.12	57.15	3.11	4.43	3.55	8.00	0.90
泰国	60.54	2.79	74.70	2.39	3.19	4.59	17.53	1.78
英国	90.51	2.89	64.99	2.40	3.96	3.78	8.05	0.91
美国	82.06	3.10	70.58	2.40	3.93	3.81	12.72	2.37

注：①本表呈现的是对多个年份的各结果和条件数据进行了平均化处理的结果；②巴西缺少 2016 年、2017 年的创业合意性数据，使用 2015 年的数据代表；加拿大与美国缺少 2015 年的创业合意性数据，使用 2016~2017 年的均值数据代表。

1. 结果测量

(1) 创业活跃度(EA)。本文使用GEM成人调查报告中的早期创业活动率(TEA)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创业活跃度。具体而言,创业活跃度是指在18~64岁的年龄群体中,参与企业创建或运营企业少于3.5年的个体所占的比例,包含新生创业者和新创企业所有者(Levie & Autio, 2008)^①。

(2) 创业质量(EQ)。创业质量反映了创业活动所创造价值的程度(Giotopoulos et al., 2017)。高成长期望创业能够产生更多工作岗位从而创造更高社会价值,被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反映了创业质量。本文使用GEM成人调查报告中高成长期望创业活动率来衡量创业质量。在本文中,创业质量是指新生创业者或新创企业所有者中预期5年内创造20个或更多工作岗位的个体占18~64岁工作人群的比例(Levie & Autio, 2008; Giotopoulos et al., 2017)。

2. 条件测量

(1) 政府管制(GR)。该条件是指政府为了促进创业活动,降低创业风险而制定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Reynolds et al., 2005)。它衡量了国家法律保护私有产权的程度以及政府对商业规制的效率(Lim et al., 2010)。采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产权保护自由度和商业规制自由度两个指标进行测量。参考前人研究(Stephan & Uhlaner, 2010; Thai & Turkina, 2014),本文对产权保护和商业规制通过求均值的方式进行聚合,用来测量政府管制。指标分值从0到100,

数值越大表示政府管制制度质量越高。

(2) 金融可得性(AF)。该条件是指创业者获得创业资金的便利程度(Levie & Autio, 2008)。该条件涉及GEM专家数据库的八个调查题项,涉及政府贷款与补贴、风险投资、股市、银行、众筹等渠道(杨英等, 2021; Levie & Autio, 2008)^②。一般来说,金融可得性指数越高,创业者越容易获取所需的创业资金。

(3) 创业合意性(SDE)。该条件指社会公众有关创业活动的地位和回报的主观规范和普遍看法(Koellinger, 2008; Stephan & Uhlaner, 2010)。该条件涉及GEM成人调查报告中的三个调查题项,分别是:社会公众是否把创业看成工作替代的好选择?公众是否认为成功的创业者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社交媒体是否对创业关注度很高,经常报道创业者和创业活动?本文通过对三个调查题项进行均值化处理来衡量创业合意性(Stephan & Uhlaner, 2010)。一般来说,创业合意性分数越高,表明社会公众越尊重创业行为,创业者的社会地位也越高,社会的创业氛围越浓厚。

(4) 人力资本(HC)。该条件反映了国家创业教育体系的质量,并涉及GEM专家数据库的六个调查题项,测量了创业基础教育和创业高等教育。创业基础教育涉及三个题项:中小学教育鼓励创造性、自立和个人原创;中小学教育提供了充分的市场经济原理的指导;中小学教育充分关注创业和创办公司。创业高等教

^① 其中新生创业者是指18~64岁的年龄群体中正在参与创建企业的个体,这些人积极参与新创企业创立但尚未支付工资,或发生了任何其他支付但未超过三个月;新创企业所有者是指18~64岁的年龄群体中已经创建企业的个体,这些人拥有和管理业务运行且支付了工资或发生了任何其他支付已经超过三个月,但不到42个月。

^② GEM专家数据库对这八个调查进行了均值化处理,产生了创业融资的指标。因此本文选择该指标衡量金融可得性。

育涉及三个题项：高等院校为新企业的创办和成长提供了良好而充分的准备；工商管理教育的水平为新企业的创办和成长提供了良好而充分的准备；职业、专业和继续教育体系为新企业的创办和成长提供了良好而充分的准备。本文对创业基础教育和创业高等教育进行了均值化处理，以衡量人力资本（杨英等，2021；Levie & Autio，2008）。一般来说，人力资本指数越高，国家创业教育体系越完善，从而潜在创业者拥有更丰富的创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5）绩效性文化（PBC）。该条件涉及GLOBE数据库的五个指标，分别是绩效导向、不确定性规避、未来导向、小团体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本文通过对该五个指标进行均值化处理来衡量绩效性文化（Stephan & Uhlaner，2010），其中权力距离和小团体集体主义进行了反向转化。如果一个社会的绩效性文化得分越高，则说明社会越重视个人成就和目标实现，越重视系统性的未来规划。

（6）支持性文化（SSC）。该条件涉及GLOBE数据库的人际关怀导向和恃强性两个指标。本文通过对这两个指标进行均值化处理来

衡量支持性文化（Stephan & Uhlaner，2010），其中恃强性经过了反向转化。一般来说，社会支持性文化分数越高，则说明社会越支持相互合作，从而具有积极的人际关系和对失败更加宽容。

3. 结果与条件的校准

遵循前人的研究，本文使用直接校准法将结果和条件的原始数据校准成隶属于 $[0, 1]$ 的模糊集隶属度分数（Ragin，2008）。表3展示了结果和条件的详细校准信息。对于创业活跃度、创业质量、创业合意性、金融可得性、人力资本、绩效性文化、支持性文化，本文借鉴程建青等（2019）、杨英等（2021）的方法，使用样本数据的上四分位数，上、下四分位数的均值，下四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的锚点。对于政府管制条件，美国传统基金会在2015~2017年使用49.9、59.9、69.9、79.9把国家分为极度不自由（0~50）、较不自由（50~60）、中度自由（60~70）、较自由（70~80）和高度自由（80~100）五类。基于该等级划分标准，本文使用100、69.9、49.9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的锚点。

表3 结果与条件的校准

条件与结果			目标集合	锚点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	创业活跃度（EA）		高创业活跃度	13.10	10.57	8.03
	创业质量（EQ）		高创业质量	1.43	0.89	0.35
条件	需求侧	政府管制（GR）	优良政府管制	100	69.9	49.9
		金融可得性（AF）	高金融可得性	2.99	2.68	2.36
	供给侧	创业合意性（SDE）	高创业合意性	71.79	65.67	59.54
		人力资本（HC）	优质人力资本	2.55	2.37	2.19
	文化	绩效性文化（PBC）	强绩效性文化	3.93	3.59	3.24
		支持性文化（SSC）	强支持性文化	4.28	4.02	3.76

四、实证分析

（一）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在进行组态分析前，需要对条件的必要性进行检测。条件的必要性是根据一致性（con-

sistency）进行判断。一般来说，当一致性分数大于 0.9 时，则认为该条件对于结果是必要的（Ragin，2008）。表 4 呈现了条件的必要性检测结果，数据显示各个条件的一致性都小于 0.9，说明不构成高创业活跃度和高创业质量的必要条件。

表 4 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的必要性分析

条件	结果	
	高创业活跃度	高创业质量
政府管制（GR）	0.36	0.51
~政府管制（~GR）	0.76	0.65
金融可得性（AF）	0.48	0.59
~金融可得性（~AF）	0.59	0.49
创业合意性（SDE）	0.69	0.73
~创业合意性（~SDE）	0.37	0.36
人力资本（HC）	0.57	0.52
~人力资本（~HC）	0.49	0.59
绩效性文化（PBC）	0.43	0.55
~绩效性文化（~PBC）	0.69	0.52
支持性文化（SSC）	0.53	0.50
~支持性文化（~SSC）	0.52	0.58

（二）组态分析

本文使用 fsQCA 3.0 软件分析 32 个国家案例，识别出产生高创业活跃度和高创业质量的组态。参考现有研究，本文将高创业活跃度和高创业质量的案例频数阈值皆设为 1（Schneider & Wagemann，2012），将 PRI 一致性阈值皆设定为 0.75（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将原始一致性阈值皆设定为 0.80（Schneider & Wagemann，2012）。由于现有研究有关六个条件和创业活跃度与创业质量的关系尚未形成一致性结论或缺

乏明确的理论预期（Schneider & Wagemann，2012；张明等，2019），因此在进行反事实分析过程中，面对六个条件的何种情况会产生高创业活跃度或高创业质量时，本文选择了“存在或缺乏”的默认选项^①。fsQCA 3.0 软件输出三种解，即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本文使用中间解进行分析。本文将同时出现在中间解和简约解的条件看作核心条件，只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视为边缘条件（杜运周和贾良定，

① 感谢审稿人对标准分析（standard analysis）中质蕴涵项选择的建议。受到良好创业教育的个体拥有丰富的创业知识和技能，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具有更强的解决问题和决策的能力。尊重创业（创业合意性高）的社会更可能为创业者提供资源支持，因此即使在金融资源缺乏的国家，拥有优质人力资本的创业者具有更强的信心解决问题，产生更高的创业成长意愿，从而提高创业质量。故在对高创业质量进行标准分析时，选择“金融可得性缺失×创业合意性存在×人力资本存在”作为质蕴涵项。

2017)。表5报告了产生高创业活跃度和高创业质量的组态分析结果。

表5 产生高创业活跃度和高创业质量的组态

理论类别	条件	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				产生高创业质量的组态			
		1a	1b	2	3	1	2	3	4
需求侧	政府管制 (GR)	⊗	⊗	⊗	⊗	⊗	⊗	●	
	金融可得性 (AF)	⊗	⊗	⊗	•	⊗	⊗		•
供给侧	创业合意性 (SDE)		⊗	●	●		●	●	●
	人力资本 (HC)	●	●	⊗	●	⊗	●	⊗	●
文化	绩效性文化 (PBC)	⊗	⊗	⊗		⊗	⊗	●	●
	支持性文化 (SSC)	⊗		●	●	●	⊗	⊗	●
典型案例		墨西哥 阿根廷 哥伦比亚	墨西哥 阿根廷 厄瓜多尔	埃及	印度尼西亚 中国 泰国	伊朗 埃及	哥伦比亚	以色列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爱尔兰 中国
原始覆盖度		0.16	0.15	0.12	0.19	0.19	0.10	0.17	0.21
唯一覆盖度		0.02	0.03	0.06	0.16	0.12	0.05	0.12	0.15
一致性		0.88	0.87	0.85	0.87	0.90	0.93	0.96	0.87
总体解覆盖度		0.43				0.53			
总体解一致性		0.89				0.90			

注：●或•表示该条件存在，⊗或⊙表示该条件缺失，“空白”表示可存在亦可缺失的条件；●或⊗表示核心条件，•或⊙表示边缘条件。

由表5可知，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组态有四种，单个解和总体解的一致性都超过了0.75，其中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89。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43，说明两个组态对高创业活跃度具有较高的解释力。产生高创业质量组态有四种，单个解和总体解的一致性都超过了0.75，其中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90。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53，说明四个组态对高创业质量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1. 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析

本文发现了四种激活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组态，本文结合案例分析对组态进行分析和命名，具体如下：

(1) 人力供给型。组态1a表明无论社会中

是否存在高社会合意性，即使在缺乏优良政府管制（核心条件）、缺乏高金融可得性（核心条件）、缺乏强绩效性文化（边缘条件）以及缺乏强支持性文化（边缘条件）的国家，优质的人力资本能够鼓励潜在创业群体投身于创业活动。此组态覆盖了三个案例，分别是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组态1b表明无论社会中是否存在强支持性文化，即使在缺乏优良政府管制（核心条件）、缺乏高金融可得性（核心条件）、缺乏高创业合意性（边缘条件）以及缺乏强绩效性文化（边缘条件）的国家，优质的人力资本也能够提高国家创业活跃度。此组态覆盖了三个案例，分别是墨西哥、阿根廷、厄瓜多尔。潜在创业群体通过高质量的创业教育获得

创业过程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Chowdhury et al., 2015; Coleman, 1988), 提高自身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的能力 (Clercq et al., 2014), 进而有助于形成创业意向 (任胜钢等, 2017), 从而激发创业活动。此外, 良好的教育体系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杜运周等, 2020), 能够满足拥有创业意向的潜在创业群体的人才需求, 增强他们对创业的信心, 从而激发创业活动 (Lim et al., 2016)。人力供给型组态的典型案例分析是墨西哥。墨西哥重视通过创业教育提高国民的创业知识和创新能力。2015 年墨西哥政府与墨西哥高等教育机构协会合作, 加强高等教育机构对学生创业创新文化的培养, 并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参与和支持创业项目^①。以蒙特雷科技大学为例, 该大学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研究能力提升到学校战略发展高度。学校常年开设知识产权、技术性企业发展技巧、研究创新方法论等课程, 将创业教育与培养研究创新能力结合, 通过培养学生研究创新能力来提升学生创业能力。据统计, 该校毕业生在五年后参与创业人数比例达到 39%, 在十年后创业人数比例上升至 51% (段俊霞和沈红, 2015)。

(2) 供给-文化匹配型。组态 2 表明即使在缺乏优良政府管制 (核心条件)、缺乏高金融可得性 (核心条件)、缺乏优质人力资本 (边缘条件) 以及缺乏强绩效性文化 (边缘条件) 的国家, 高创业合意性 (核心条件) 和强社会支持性文化 (核心条件) 的社会环境也能够促使潜在创业群体投身于创业活动。强支持性文化的社会具有人际关系导向, 能够容忍失败和错误, 减轻潜在创业者因创业失败而承受的来

自周围的压力 (Stephan & Uhlaner, 2010; 赵向阳等, 2012), 有利于形成尊重创业的社会氛围 (Stephan & Uhlaner, 2010), 并且强支持性文化的社会鼓励相互合作, 潜在创业者能够获得所需的帮助和信息等资源支持 (Davidsson & Honig, 2003; Muralidharan & Pathak, 2017)。高创业合意性的社会氛围能让潜在创业群体感受到社会大众对创业活动和创业者的尊重和认可, 满足潜在创业群体的个体需求, 增强他们的创业意愿 (程建青等, 2019)。此外, 在人人讨论创业成功榜样、媒体争相报道创业活动的氛围下, 创业知识溢出和传递现象更加普遍, 有利于潜在创业者的知识获取, 从而激发创业活动 (杨英等, 2021; 郑馨等, 2017)。此组态覆盖一个案例 (埃及)。埃及政府自 2017 年颁布新《投资法》, 旨在优化营商环境, 简化审批流程, 但是对互联网金融、自媒体等新经济领域监管仍然严格。例如, 2018 年 7 月埃及政府通过媒体监管法案, 监管拥有 5000 名粉丝以上的自媒体用户。即使如此, 埃及社会仍具有良好的创业氛围。2016 年 GEM 报告表明, 超过 87% 的民众尊重和认可创业者, 超过 83% 的民众将创业视为良好的职业选择。埃及经常组织各种创业交流活动, 如著名的 RiseUp Summit 创业峰会等。鼓励相互支持的社会文化也为创业者提供了便利, 增强了他们的创业热情。支持创业的良好氛围和文化使埃及人积极进入电子商务 (如 Brimore、Homzmart)、本地服务 (如 Breadfast、Elmenus)、出行物流 (如 Swvl、Hailan) 等领域, 使埃及成为中东北非地区创业活

^① 《墨西哥支持创新创业做法》, <http://mx.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603/20160301268280.shtml>。

动增速最快的国家^①。

(3) 需求-供给-文化匹配型。组态 3 表明无论是否存在强绩效性文化,即使在缺乏优良政府管制(核心条件)的国家,只要在高创业合意性(核心条件)和强社会支持性文化(核心条件)的环境中,受到良好创业教育的潜在创业群体能够获得充足的金融资源时(边缘条件),就会投入于创业活动。潜在创业群体通过优质创业教育获得所需的创业知识和技能(Chowdhury et al., 2015; Coleman, 1988),拥有较高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的能力(Clercq et al., 2014)。尊重创业的社会氛围能够提高潜在创业群体的创业自我效能感,有利于他们识别潜在的创业机会(程建青等, 2019)。当潜在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时,包容失败的支持性文化有助于减少他们对创业失败的担忧,降低因创业失败而承受的来自周围的压力(Stephan & Uhlaner, 2010; 赵向阳等, 2012)。但是在计划创业时,潜在创业者往往面临资金约束,这严重影响他们的创业意向的实施(杜云周等, 2020),而便利的融资环境能够缓解潜在创业者在初创阶段面临的资金约束,从而激活创业活动(Lim et al., 2010)。此组态覆盖三个案例,分别是印度尼西亚、中国和泰国。泰国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以泰国为例,泰国于 2016 年推出了“创业泰国”(Startup Thailand)计划,旨在发展本国的创业生态系统,提供金融资源支持,提高创业者的社会地位,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如 2016 年,泰国政府拨款 5.7 亿美元以支持

2500 家初创企业的发展,同时还与风险投资公司合作为企业运营提供资金支持^②。泰国政府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不仅通过院校等机构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还出台优惠政策大力引进外来人才。此外,佛教文化作为泰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创业活动提供了温床。在泰国,师佛一体、寺校同义,泰国学校把佛经作为必修课程,佛教文化深刻影响民众的性格和生活态度,如忍让谦恭、恬淡宽容(刘晓红, 2009)。这种支持性文化能够鼓励民众不惧创业失败带来的压力,从而提高了泰国的创业活跃度。

通过分析前三个组态发现,即使缺乏优良政府管制和完善金融制度,只要存在优质人力资本(组态 1a、组态 1b),或存在高社会合意性和强支持性文化(组态 2),潜在创业群体也会积极投身于创业活动。这说明非正式制度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超过了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不健全的国家,非正式制度能够弥补正式制度相对缺乏带来的不利影响,开展创业活动。

2. 高创业质量的驱动机制分析

本文发现了四种激活高创业质量的组态。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组态,本文结合案例分析对组态进行分析和命名,具体如下:

(1) 支持文化型。组态 1 表明无论社会中是否存在强社会合意性,即使在缺乏优良政府管制(边缘条件)、缺乏高金融可得性(核心条件)、缺乏优质人力资本(核心条件)以及缺乏强绩效性文化(边缘条件)的国家,只要

① 《非洲十国创投市场调研报告之埃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3482191346934150&wfr=spider&for=pc>。

② Building Southeast Asia's startup ecosystem through True Digital Park, <https://www.techinasia.com/building-southeast-asias-startup-ecosystem-true-digital-park>。

处于强支持性文化(核心条件)的社会,创业者将会拥有高成长意愿。强支持性文化的社会具有人际关系导向,能够容忍失败和错误,降低潜在创业者因创业失败而承受的来自周围的压力(Stephan & Uhlaner, 2010; 赵向阳等, 2012),有利于形成尊重创业的社会氛围(Stephan & Uhlaner, 2010)。在宽容失败、尊重创业的社会,创业者将更倾向于具有冒险精神,积极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有利于初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积极的社会氛围也会提升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Choi & Chang, 2009),从而提高创业者对未来的信心,即使缺乏优质政府管制和金融可得性,他们也能够百折不挠地经营初创企业(Dinger & Dickhäuser, 2013)。在企业新创和发展阶段,创业者能够从鼓励相互合作和支持的社会获得所需的帮助和信息等资源支持来运营新创企业(Muralidharan & Pathak, 2017),这可以弥补人力资本缺失导致的劣势。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支持性文化能够补充或替代政府管制、金融可得性等正式制度发挥更强烈的作用(North, 1990; 李新春等, 2016),增强创业者的信心,提升创业质量。此组态覆盖了两个案例,分别是伊朗和埃及。伊朗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伊斯兰教是伊朗的主要宗教,全国大部分民众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文化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特征,鼓励民众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伊斯兰文化具有包容、多元、合作的特征,善于接纳新事物和使用新技术(杨桂萍, 2019)。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社会大众支持创业活动和尊重创业者,即使是创业失败者。创业者能够获得来自周围人群的支持和资源,并在创业过程中擅长应用新

技术和新想法。这种宽容、人文导向的社会文化使伊朗创业市场涌现了许多有潜力的初创企业(如Digikala, Snapp等)。

(2) 供给型。组态2表明即使在缺乏优良政府管制(边缘条件)、缺乏高金融可得性(核心条件)、缺乏强绩效性文化(边缘条件)和缺乏强支持性文化(边缘条件)的国家,只要处于强社会合意性(核心条件)和存在优质人力资本(核心条件)的社会,创业者便会拥有高成长意愿。创业者能够通过高质量的创业教育获得创业过程所需的知识和技能(Chowdhury et al., 2015; Coleman, 1988),提高自身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的能力(Clerc et al., 2014),这有利于创业者准确抓住和利用机会,从而提升创业绩效(李文静, 2015)。在创业阶段,创业者将面临众多挑战,而受到高质量教育的创业者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拥有更强的解决问题和决策的能力(Chandler & Hanks, 1994)。新创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优质人力资源的支持,良好的教育体系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杜运周等, 2020),能够满足创业者的人才需求,增强他们对创业的信心。新创企业往往面临资金约束,这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然而,尊重和认可创业的社会更愿意帮助创业者,即使缺乏来自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创业者也能够获得来自家人或朋友等非正式渠道的金融支持,从而促进企业成长和发展,提升创业质量(Brinckmann et al., 2010; Rauch & Frese, 2007)。此组态覆盖了1个案例(哥伦比亚)。哥伦比亚被众多机构认为是拉美地区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具创新活力的国家。哥伦比亚政府重视创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旨在培养更多拥有

创业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正如哥伦比亚伊瓦格市长吉列尔莫·哈拉米略所说,哥伦比亚在不断地改革教育体系以适应经济发展和创业的需求,鼓励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创新精神^①。除了政府对创业教育的支持外,哥伦比亚社会亦营造了良好的创业氛围。GEM 报告表明,2014 年之前,超过 90%的民众表示媒体经常报道创业活动和优秀的创业者。知名初创企业如 Rappi、Liftit 等的成功也提升了创业的吸引力^②。这些都提高了创业者对创业前景的预期,增强了创业者的成长意愿。

(3) 需求-供给-文化匹配型。组态 3 表明无论是否存在高金融可得性,即使在缺乏优质人力资本(核心条件)和缺乏强支持性文化(边缘条件)的国家,只要处于强社会合意性(核心条件)和强绩效性文化(核心条件)的社会,优良政府管制(核心条件)便将激发创业者的高成长意愿。尊重和认可创业的社会能够提升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意向,鼓励他们投身于创业活动(程建青等,2019;杨英等,2021)。然而,创业活动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初创企业的成长离不开外部的支持和内部的助力。优良的政府管制拥有有效的商业规制和产权保护制度,能够为新创企业提供外部支持。优良政府管制既可以为创业者经营企业和资产保护提供制度性保障,有效降低创业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剽窃等侵权行为),也可以降低创业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张龙鹏等,2016),使创业者将创业资源用于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

等生产性活动,而不是游说等非生产性活动(Davidsson & Henrekson, 2002),这有利于企业的成长和发展(Stenholm et al., 2013;黄亮雄等,2020;张龙鹏等,2016)。除了政府管制的支持,绩效性文化能够为企业成长提供内部助力(Brinckmann et al., 2010; Rauch & Frese, 2007)。即使经历挫折和各种挑战,拥有绩效性文化导向的创业者也更可能保持初心和耐心。他们能够抓住机会,制定更高的目标,并通过系统性的规划和科学战略来实现目标(Shane & Venkataraman, 2000),从而促进新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形成更强的创业成长意愿(赵向阳等,2012),提升创业质量。此组态覆盖了两个案例,分别是以色列和澳大利亚。以色列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以色列被誉为“创业的国度”、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中心。以色列政府为创业活动建立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世界银行 2018 年营商环境便利度报告显示,以色列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54 位。为了支持创业活动,2011 年颁布了“天使法”,旨在鼓励对新创企业的投资。以色列社会营造了支持性的创业氛围。2016 年 GEM 数据表明,超过 85% 的以色列人非常尊重和认可创业。以色列社会机构如特拉维夫大学经常邀请知名创业者分享创业经验,这些成功的创业故事增强了潜在创业者的创业信心和创业意向。以色列创业活动的蓬勃发展,还受到其文化的影响。正如《创业的国度》作者索尔·辛格所言,以色列人喜欢挑战、追求成就、“不满足于安逸生活”的特

① 《对话哥伦比亚伊瓦格市长:创新创业迫切需要改革旧式教育》,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6054547812678688&wfr=spider&for=pc>。

② 《狙击拉美下一只独角兽!》,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6984043945412148&wfr=spider&for=pc>。

征极大地促进了以色列的创业活动^①。

(4) 全因素型。组态 4 表明无论是否存在优良政府管制,只要处于高金融可得性(边缘条件)、强社会合意性(核心条件)、优质人力资本(核心条件)、强绩效性文化(核心条件)和强支持性文化(核心条件)的社会,创业者便会拥有高成长意愿。在尊重和认可创业的社会,潜在创业者更愿意投身于创业活动(程建青等,2019;杨英等,2021)。在创业过程中,良好的创业教育体系不仅能为创业者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杜运周等,2020),也能使创业者拥有更丰富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对机会的识别和开发能力(Davidsson & Henrekson, 2002),并且高绩效导向社会的创业者能够抓住创业机会,制定更高的目标,并通过系统性的规划和科学战略来实现目标(Shane & Venkataraman, 2000)。在目标实现过程中,处于强支持性文化导向社会的创业者更倾向于使用新方法和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技术的使用不仅可能会产生更好的绩效,还会提高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Choi & Chang, 2009)。具有高自我效能感的创业者拥有强烈的信心,即使缺乏高质量的政府管制,他们也能够百折不挠地经营初创企业(Dinger & Dickhäuser, 2013)。初创企业的发展和成长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源支持(Hurst & Lusardi, 2004;谢智敏等,2020)。获得充足金融资源的创业者更能坚定地促进创业企业的发展,不断扩大创业企业的规模和提高企业绩效,从而进行高质量创业(Bowen & Clercq, 2008;

George & Prabhu, 2000)。此组态覆盖了三个案例,分别是加拿大、爱尔兰和中国。中国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自从 2014 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我国掀起了“草根创业”“大众创业”的新浪潮,“创业者”成为了热门的职业选择。此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如 2015 年颁布的《国务院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旨在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实现便利融资。同时,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创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创新精神,鼓励学生参与创业实践。截至 2016 年底,全国高校的创业创新相关课程已经开设 2.3 万余门,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和创业俱乐部的数量也超过了 1 万个^②。在这种尊重创业、宽容失败、鼓励追求梦想的良好创业氛围里,产生了摩拜、滴滴等创新企业。来自政府、社会、学校的支持极大地增强了创业者的信心和创业成长预期。

通过对比四个组态,组态 4 的覆盖度最高(0.21),说明该组态是提高创业质量的一个主要组态。对比四个组态发现,即使在其他条件缺失的情境下,支持性文化也能提升创业质量(组态 1)。在其他条件缺失的情境下,支持性文化的社会宽容失败和错误,也能够减少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担忧。支持性文化的社会鼓励相互合作和支持,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所需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消除因人力资本缺少和正式制度不健全带来的不利影响。

① 《以色列科技创业有什么新趋势?》, <https://www.huxiu.com/article/19475.html>。

② 《中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呈星火燎原之势》,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2017090801/mtbd_2017090801/201709/t20170911_314104.html。

3. 高创业活跃度与高创业质量的驱动机制比较分析

通过对比产生高创业活跃度和高创业质量的组态中是否具有共同要素条件的存在或缺失,以挖掘两类创业活动驱动机制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通过对比组态,笔者发现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 1a 和产生高创业质量的组态 2 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其相似性体现在,这两种组态的政府管制、金融可得性、绩效性文化和支持性文化都缺失,而人力资本条件存在;其差异性体现在,这两种组态的创业合意性的存在缺失情况不同。具体而言,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 1a 中,创业合意性是亦可存在亦可缺失的条件,说明组态 1a 包含两个子组态,其中一个组态包含创业合意性存在条件,另一个组态包含创业合意性缺失条件;而产生高创业质量的组态 2 包含创业合意性存在条件。此外,这两个组态的典型案列也能体现出这种差异性。在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 1a 中,存在着三个典型案列:墨西哥、阿根廷和哥伦比亚;而在产生高创业质量的组态 2 中,只存在哥伦比亚。墨西哥、阿根廷只具有高创业活跃度,而哥伦比亚既具有高创业活跃度,也具有高创业质量。这种现象可能是由创业合意性所致。

基于以上比较分析,本文发现在其他条件缺失的情境下,优质的人力资本只能产生高创业活跃度,而不足以激发高创业质量。只有同时具有高社会合意性特征的社会,才能产生高创业质量。本文认为,虽然人力资本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与先前研究一致(程建青等, 2019; 杜运周等, 2020; 杨英等, 2021),但是

新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也离不开其他资源(如金融资源)的支持(Hurst & Lusardi, 2004)。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新创企业需要获得大量的资源用于新产品研发、新市场的开拓(谢智敏等, 2020)以及探索新的成长机会(Wiklund & Shepherd, 2011)。如果无法解决资源约束的困境,新创企业无法进一步成长,甚至会因此而夭折(Bradley et al., 2011)。在高社会合意性的社会,人们更加尊重和认可创业,媒体会大力宣传创业活动。尊重和认可创业的社会规范能够补充或替代政府管制、金融可得性等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李新春等, 2016; 郑馨等, 2017)。在这种氛围下,创业者更加容易获得资金、技术等资源(郑馨等, 2017),从而促进企业成长和发展,提升创业质量。

(四) 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调整一致性阈值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王聪和王凤彬, 2018; 张明和杜运周, 2019)。本文将原始一致性由 0.8 提高至 0.85, 结果如表 6 所示。对比表 6 和表 5 的结果发现,调整原始一致性水平后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 2'和组态 3'(见表 6)与未调整一致性水平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 2 和组态 3(见表 5)相同,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组态 1a'和组态 1b'(见表 6)是高创业活跃度组态 1a 和组态 1b(见表 5)的子集。调整原始一致性水平后产生高创业质量组态 1'、组态 2'和组态 3'(见表 6)与未调整一致性水平所产生的高创业质量组态 1、组态 2 和组态 3(见表 5)相同,高创业质量组态 4'(见表 6)是高创业质量组态 4(见表 5)的子集。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表 6 提高原始一致性阈值的稳健性检验

条件	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				产生高创业质量的组态			
	1a'	1b'	2'	3'	1'	2'	3'	4'
政府管制（GR）	⊗	⊗	⊗	⊗	⊗	⊗	●	●
金融可得性（AF）	⊗	⊗	⊗	•	⊗	⊗		•
创业合意性（SDE）	●	⊗	●	●		●	●	●
人力资本（HC）	●	●	⊗	●	⊗	●	⊗	●
绩效性文化（PBC）	⊗	⊗	⊗		⊗	⊗	•	•
支持性文化（SSC）	⊗	●	●	●	●	⊗	⊗	●
原始覆盖度	0.08	0.07	0.12	0.19	0.19	0.10	0.17	0.16
唯一覆盖度	0.04	0.04	0.06	0.16	0.12	0.05	0.12	0.10
一致性	0.85	0.89	0.85	0.87	0.90	0.93	0.96	0.94
总体解覆盖度	0.36				0.48			
总体解一致性	0.88				0.92			

注：●或•表示该条件存在，⊗或⊗表示该条件缺失，“空白”表示可存在亦可缺失的条件；●或⊗表示核心条件，•或⊗表示边缘条件。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发现

以 2015~2017 年 GEM 数据库为基础构建了 32 个国家的创业调查数据为样本，本文整合了需求侧、供给侧和文化导向三类宏观因素，使用 fsQCA 方法探究政府管制、金融可得性、创业合意性、人力资本、绩效性文化和支持性文化六个条件组态如何影响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

首先，本文发现了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四种组态，可以归纳为三类：人力供给型、供给-文化匹配型、需求-供给-文化匹配型；人力资本对提升创业活跃度发挥着重要作用。该条件既可以与其他条件良性耦合而提升创业活跃度，也可以在其他条件缺失的情境下提高创业活跃度。其次，本文发现了产生高创业质量的四种组态，

— 82 —

分别是支持文化型、供给型、需求-供给-文化匹配型以及全因素型。支持性文化对提升创业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支持性文化既可以与其他条件良性耦合而提升创业质量，也可以在其他条件缺失的情境下激发高质量创业。最后，本文通过分析产生高创业活跃度和产生高创业质量的组态，发现这两类组态间的差异性。在其他条件缺失的情境下，优质人力资本只能产生高创业活跃度，而不足以激发高创业质量。只有同时具有高社会合意性特征的社会，才能产生高创业质量。因此，政策制定者应明晰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的差异性，以便制定精确且有效的创业政策。

（二）研究贡献

（1）本文使用 QCA 方法研究了国家创业活动，为现有矛盾的研究结论提供了新的解释。创业活动是一个受到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过程（宋丽红等，2015；赵向阳等，2012），而

受传统研究方法的限制,现有文献基本是探讨一类或两类因素的组合效应,对更多类因素的综合影响无从考察。本文使用 QCA 方法,检验了需求侧、供给侧和文化导向因素的联动匹配,剖析了高创业活跃度和高创业质量的驱动机制。与现有研究一致(程建青等,2019;杜运周等,2020;高伟等,2018),本文凸显了运用 QCA 方法研究多重因素组态效应的重要性,验证了创业活动的提升并不仅由某一类因素单独决定,而是依赖多类因素的联动效应,如在分析需求侧与创业活动的关系时,也需要考虑文化或供给侧因素的影响。

(2) 本文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了包含文化因素在内的三类因素的联动效应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拓展了创业领域有关文化因素的 QCA 研究,实证讨论了创业折衷理论关于多类因素联动影响创业活动以及因素间互动性的观点。虽然创业折衷理论从整体视角分析了创业活动,但是受限于研究方法,现有研究尚未实证分析因素间影响创业质量的联动效应。本文使用 QCA 方法检验了该理论,扩展了该理论在解释创业活动因果复杂性的应用。此外,虽然国内外学者使用 QCA 方法研究多种因素影响创业活动的联动效应(Devece et al., 2016; Douglas et al., 2020; Wu et al., 2019; 程建青等, 2019; 杜运周等, 2020),但较少考虑文化的重要作用。本文发现支持性文化对创业质量的重要作用。强支持性文化既能与其他条件的存在联动作用于创业质量,也可以在其他条件缺失的情况下影响创业质量。这一结论呼应了 Stephan 和 Uhlaner (2010) 有关支持性文化与创业质量的研究结果。

(3) 本文探索了创业活动的“质”(创业质量)的驱动机制和创业活动的“量”(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揭示了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的驱动机制的差异性,增强了对创业活动的理论理解。现有研究侧重于单独分析创业活跃度或创业质量,而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反映了创业活动的不同维度,其组态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本文对比分析了创业质量和创业活跃度的组态发现,在其他条件缺失的情境下,优质人力资本只能产生高创业活跃度,而不能激发高创业质量。只有同时具有高社会合意性特征的社会,才能产生高创业质量。该结论呼应了 Capelleras 等(2019)的结论:尊重和认可创业的社会合意性能够与反映人力资本的创业经验交互地正向影响创业质量。本文丰富了有关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的对比研究,增强了对创业质量和创业活跃度的差异性理解。

(三) 管理启示

本文发现了多条产生高创业活跃度和高创业质量的组态,说明提升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具有多种实现方式。不同国家既可以选择与本国条件相似的路径,制定相应的政策;也可以选择较不相似的路径,通过学习和改革,以促进创业活动。对于中国而言,本文提出以下实践启示:①政府应革创新创业政策制定理念,从注重创业活跃度转向同时关注创业质量与创业活跃度的差别化政策制定。在本文的研究中,优质人力资本仅能提高创业活跃度,只有与高社会合意性的良性耦合,才能产生高创业质量。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明晰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质量的差异,以制定差异化的、有针对性的政策。②对于提升创业活跃度而言,健全创业教

育体系、培养创业领域人才仍然是重要的举措。通过分析产生高创业活跃度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既可以与其他条件良性耦合而提升创业活跃度，也可以在其他条件缺失的情境下提高创业活跃度。因此，在我国创业活跃度不断下滑的特殊阶段，加强对创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有助于培养拥有创业领域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增强他们对创业机会的把握能力和开发能力，从而鼓励潜在创业群体投身于创业活动。③对于提升创业质量，政策制定者不仅需要重视对创业活动的正面宣传，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创业合意性），也应该重视培养社会的支持性文化。由产生高创业质量的四种组态可知，这两种因素对于提升创业质量具有重要作用。社会合意性与其他条件的良性耦合有助于产生高创业质量。支持性文化既可以与其他条件良性耦合而提升创业质量，也可以在其他条件缺失的情境下激发高质量创业。虽然文化的显著性改变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是在创业教育中融入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教育，对培育创新创业型人才和提升未来高质量创业将有重要作用。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值得未来进一步探究：①本文引入了折衷理论，该理论涵盖六类因素，但由于本文旨在分析宏观层次影响因素，以及囿于创业均衡和实际率的数据可得性，仅分析了供给侧、需求侧和文化因素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纳入更全面的框架内因素来分析创业活动的驱动因素。②本文的要素条件和结果的数据来自三个数据库，筛选出的案例较少，后续研究可以整合其他数据来源，

扩大研究样本。③本文未能对案例进行深入的质性分析，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展开深入的案例研究，以揭示不同组态对创业活动影响的内在过程。④本文是一项横截面研究，未能考察不同组态对创业活动影响的时间效应。未来研究可以构建面板数据，分析不同组态效应随时间呈现出的动态演化问题。

接受编辑：杜运周

收稿日期：2019年12月19日

接受日期：2021年11月29日

作者简介：

郭翠，攀枝花学院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2013年于韩国高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Health Expectations* 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目前研究兴趣是数据挖掘、创业管理、金融风险等。

张振，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曾在 *Health Expectations* 上发表论文，目前研究兴趣是创业、在线社区。

宋丽红（通讯作者，Email: lhsong@stu.edu.cn），现为汕头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3年于中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管理世界》、*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目前研究兴趣为家族企业、创业、企业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 伯努瓦·里豪克斯、查尔斯·C. 拉金：《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杜

运周、李永发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

[2] 陈刚:《管制与创业——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管理世界》,2015年第5期。

[3] 程建青、罗瑾琰、杜运周、闫佳祺、钟竞:《制度环境与心理认知何时激活创业?——一个基于QCA方法的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9年第2期。

[4] 杜运周:《组织与创业领域——组态视角下的创业研究》,《管理学季刊》,2019年第3期。

[5] 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管理世界》,2017年第6期。

[6] 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管理世界》,2020年第9期。

[7] 段俊霞、沈红:《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的经验及启示》,《现代大学教育》,2015年第6期。

[8] 高伟、高建、李纪珍:《创业政策对城市创业的影响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技术经济》,2018年第4期。

[9] 胡汉辉、王莹、缪超男:《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组态效应对国家层面创业水平的影响——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10] 黄亮雄、孙湘湘、王贤彬:《商事制度改革有效激发创业了吗?——来自地级市的证据》,《财经研究》,2020年第2期。

[11] 李文静:《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12] 李新春、叶文平、朱沅:《牢笼的束缚与抗争:地区关系文化与创业企业的关系战略》,《管理世界》,2016年第10期。

[13] 刘晓红:《泰国的学校德育:目标、内容、途径及启示》,《外国中小学教育》,2009年第8期。

[14] 卢亚娟、张龙耀、许玉楹:《金融可得性与农村家庭创业——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年第10期。

[15] 任胜钢、贾倩、董保宝:《大众创业:创业教育能够促进大学生创业吗?》,《科学学研究》,2017年第7期。

[16] 宋丽红、李新春、梁强:《创业成长意愿的制度约束及缓解机制》,《管理学报》,2015年第9期。

[17] 王聰、王凤彬:《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总部对成员单位控制体系的构型研究——基于102家中央企业的定性比较分析》,《南开管理评论》,2018年第6期。

[18] 王玲玲、赵文红、魏泽龙:《创业制度环境、网络关系强度对新企业组织合法性的影响研究》,《管理学报》,2017年第9期。

[19] 谢智敏、王霞、杜运周、谢玲敏:《创业生态系统如何促进城市创业质量——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0年第11期。

[20] 徐广平、张金山、杜运周:《环境与组织因素组态效应对公司创业的影响——一项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年第1期。

[21] 杨桂萍:《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和谐与共的当代价值》,《中国宗教》,2019年第4期。

[22] 杨英、李岩、张秀娥、曲国丽、孙冰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如何驱动社会创业——基于效率驱动型国家的QCA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年第3期。

[23] 张龙鹏、蒋为、周立群:《行政审批对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家才能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4期。

[24] 张明、陈伟宏、蓝海林:《中国企业“凭什么”完全并购境外高新技术企业——基于94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中国工业经济》,

2019年第4期。

[25] 张明、杜运周:《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管理学报》,2019年第9期。

[26] 赵都敏、李剑力:《创业政策与创业活动关系研究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年第3期。

[27] 赵向阳、李海、A. Rauch:《创业活动的国家(地区)差异:文化与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管理世界》,2012年第8期。

[28] 郑馨、周先波、张麟:《社会规范与创业——基于62个国家创业数据的分析》,《经济研究》,2017年第11期。

[29] 周清杰、张志芳:《进入规制强度对创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数据的分析》,《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30] 周蔚文:《知识产权保护对海外华人回国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科技管理研究》,2015年第17期。

[31] Asoni, A., & Sanandaji, T. 2014. Tax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 101-123.

[32] Autio, E. 2005.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2005 Report on High-expectation Entrepreneurship*. London: GEM Research Consortium.

[33] Autio, E., & Acs, Z. 2010.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growth aspiration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4: 234-251.

[34] Autio, E., Pathak, S. & Wennberg, K. 2013. Consequences of cultural practices for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4: 334-362.

[35] Blanchflower, D. G., & Oswald, A. J. 1998. What makes an entrepreneu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6: 26-60.

[36] Boudreaux, C. J., & Nikolaev, B. 2019. Cap-
— 86 —

ital is not enough: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formal institution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3 (3): 709-738.

[37] Bowen, H. P., & Clercq, D. D. 2008.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the allo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ffor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9: 747-767.

[38] Bradley, S. W., Kim, P. H., Klein, P. G., McMullen, J. S. & Wennberg, K. 2021. Policy for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Institutions, interventions, and societal challenge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15 (2): 167-184.

[39] Bradley, S. W., Shepherd, D. A. & Wiklund, J. 2011. The importance of slack for new organizations facing “tough”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8: 1071-1097.

[40] Brinckmann, J., Grichnik, D. & Kapsa, D. 2010. Should entrepreneurs plan or just storm the castle? A meta-analysis on contextual factors impacting the business planning-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in small firm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5: 24-40.

[41] Capelleras, J. L., Greene, F. J., Kantis, H., & Rabetino, R. 2010. Venture creation speed and subsequent growth: Evidence from South America.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48: 302-324.

[42] Capelleras, J., Contin-Pilart, I., Larraza-Kintana, M., & Martin-Sanchez, V. 2019.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aspiration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2: 3-25.

[43] Chandler, G. N., & Hanks, S. H. 1994. Market attractiveness, resource-based capabilities, venture strategies, and venture perform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9: 331-349.

[44] Choi, J. N., & Chang, J. Y. 2009.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An integration of insti-

tutional and collective dynamic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4: 245–253.

[45] Chowdhury, F. , Audretsch, D. B. , & Belitski, M. 2019. Institutions and entrepreneurship 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3: 51–81.

[46] Chowdhury, F. , Terjesen, S. , & Audretsch, D. 2015. Varieties of entrepreneurship: Institutional drivers acros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country.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0: 121–148.

[47] Clercq, D. D. , Lim, D. S. K. , & Oh, C. H. 2014. Hierarchy and conservatism in the contributions of resources to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2: 507–522.

[48]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95–S120.

[49] Cuervo, A. 2005. Individual and environmental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1: 293–311.

[50] Davidsson, P. , & Henrekson, M. 2002. Determinants of the prevalence of start-ups and high-growth firm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9: 81–104.

[51] Davidsson, P. , & Honig, B. 2003. The role of social and human capital among nascent entrepreneur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8: 301–331.

[52] Davidsson, P. , & Wiklund, J. 2000.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Challenges in the Study of Firm Growth*. In *The Blackwell handbook of entrepreneurship*. Oxford, MA: Blackwell.

[53] DeTienne, D. R. , & Chandler, G. N. 2004.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its role in the entrepreneurial classroom: A pedagogical approach and empirical test.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3: 242–257.

[54] Devece, C. , Peris-Ortiz, M. , & Rueda-Ar-

mengot, C. 2016. Entrepreneurship during economic crisis: Success factors and paths to failure.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9: 5366–5370.

[55] Dinger, F. C. , & Dickhäuser, O. 2013. Does implicit theory of intelligence cause achievement goals? Evidence from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1: 38–47.

[56] Douglas, E. J. , Shepherd, D. A. , & Prentice, C. 2020. Usin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 a finer-grained understanding of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5: 1–17.

[57] Du, Y. , & Kim, P. H. 2021.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Strategy configurations, complex environments,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in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24: 272–285.

[58] George, G. , & Prabhu, G. N. 2000. Development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catalyst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econom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5: 620–629.

[59] Giotopoulos, I. , Kontolaimou, A. , & Tsakanikas, A. 2017. Drivers of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What changes did the crisis bring about?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8: 913–930.

[60] Gompers, P. , Lerner, J. , & Scharfstein, D. 2005. Entrepreneurial spawning: Public corporations and the genesis of new ventures, 1986 to 1999.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0: 577–614.

[61] Guzmán, J. , & Javier Santos, F. 2001. The booster function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 application to the province of Seville.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13: 211–228.

[62] 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 CA: Sage, Beverly Hills.

[63] Hopp, C. , & Stephan, U. 2012. The influence

of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s on the performance of nascent entrepreneurs: Community culture, motivation, self-efficacy and start-up success.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4: 917-945.

[64] House, R. J., Hanges, P. J., Javidan, M., Dorfman, P. W., & Gupta, V. 2004. *Cultur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s: The GLOBE Study of 62 Societies*.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65] Hurst, E., & Lusardi, A. 2004. Liquidity constraints, household wealth,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 319-347.

[66] Kibler, E., & Kautonen, T. 2016. The moral legitimacy of entrepreneurs: An analysis of early-stage entrepreneurship across 26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34: 34-50.

[67] Koellinger, P. 2008. Why are some entrepreneurs more innovative than other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1: 21-37.

[68] Levie, J., & Autio, E. 2008. A theoretical grounding and test of the GEM model.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1: 235-263.

[69] Lim, D. S. K., Chang, H. O., & Clercq, D. D. 2016. Engagement in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economies: Interactive effects of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5: 933-945.

[70] Lim, D. S., Morse, E. A., Mitchell, R. K., & Seawright, K. K. 2010.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s: A comparative business systems perspectiv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4: 491-516.

[71] Lindh, T., & Ohlsson, H. 1996. Self-employment and windfall gains: Evidence from the Swedish lottery. *The Economic Journal*, 106: 1515-1526.

[72] Ma, J., & Todorovic, Z. W. 2012.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16: 299-313.

[73] McMullen, J. S., & Shepherd, D. A. 2006. Entrepreneurial action and the role of uncertainty in the theory of the entrepreneu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1: 132-152.

[74] Minniti, M., Koellinger, P., & Schade, C. 2007. I think I can, I think I can...: A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8: 502-527.

[75] Muralidharan, E., & Pathak, S. 2017.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6: 288-302.

[76] Nikolaev, B. N., Boudreaux, C. J., & Palich, L. 2018. Cross-country determinants of early-stage necessity and opportunity-motivated entrepreneurship: Accounting for model uncertainty.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56: 243-280.

[77]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8] Pathak, S., & Muralidharan, E. 2016.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heir comparative influences on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 of in-group collectivism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54: 168-188.

[79] Peterson, M. F., & Castro, S. L. 2006. Measurement metrics at aggregate levels of analysis: Implications for organization culture research and the GLOBE project.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7: 506-521.

[80] Ragin, C. C. 2008.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81] Rauch, A. , & Frese, M. 2007. Let's put the person back into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A meta-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owners' personality traits, business creation, and success.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6: 353-385.
- [82] Reynolds, P. , Bosma, N. , Autio, E. , Hunt, S. , De Bono, N. , Servais, I. , Lopez - Garcia, P. , & Chin, N. 2005.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Data collectio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1998-2003.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4: 205-231.
- [83] Rihoux, B. , & Ragin, C. C. 2008.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Related Techniques*.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 [84] Schmutzler, J. , Andonova, V. , & Diaz-Serrano, L. 2019. How context shape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s a driver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 multilevel approac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3: 880-920.
- [85] Schneider, C. Q. , & Wagemann, C. 2012. *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86] Shane, S. 2000. Prior knowledge and the discove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Organization Science*, 11: 448-469.
- [87] Shane, S. , & Venkataraman, S. 2000.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5: 217-226.
- [88] Simoes, N. , Crespo, N. , & Moreira, S. B. 2016. Individual determinants of self-employment entry: What do we really kno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30: 783-806.
- [89] Sobel, R. S. 2008. Testing Baumol: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3: 641-655.
- [90] Stel, V. A. , Storey, D. J. , & Thurik, A. R. 2007. The effect of business regulations on nascent and young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8: 171-186.
- [91] Stenholm, P. , Acs, Z. J. , & Wuebker, R. 2013. Exploring country-leve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n the rate and type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8: 176-193.
- [92] Stephan, U. , & Uhlaner, L. M. 2010. Performance-based vs socially supportive culture: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descriptive norms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1: 1347-1364.
- [93] Thai, M. T. T. , & Turkina, E. 2014. Macro-level determinants of formal entrepreneurship versus informal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9: 490-510.
- [94] Thornton, P. H. 1999. The sociology of entrepreneurship.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 19-46.
- [95] Valdez, M. E. , & Richardson, J. 2013.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macro-level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7: 1149-1175.
- [96] Verheul, I. , Wennekers, S. , Audretsch, D. , & Thurik, R. 2002. An eclectic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Policies,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In *Entrepreneurship: Determinants and Policy in a European-US Comparison*. Boston: Springer.
- [97] Wennberg, K. , Pathak, S. , & Autio, E. 2013. How culture moulds the effects of self-efficacy and fear of failure on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5: 756-780.
- [98] Wennekers, S. , Uhlaner, L. , & Thurik, R. 2002. Entrepreneurship and its conditions: A macro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ion, 1: 25-64.

[99] Wiklund, J. , & Shepherd, D. A. 2011. Where to from here? EO-as-experimentation, failure, and distribution of outcome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5: 925-946.

[100] Wu, J. , Li, Y. , & Zhang, D. 2019. Identifying women's entrepreneurial barriers and empowering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worldwide: A fuzzy-set QCA approach.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15: 905-928.

How does the Demand-side, Supply-side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Promote the Quality and Activity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A Research Based on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Guo Cui¹ Zhang Zhen² Song Lihong³

(1. School of Law, Panzhihua University;

2. Business School,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3. School of Business, Shantou University)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and policymakers. Previous studies focused on the net effect of a single factor on entrepreneurship but less on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multiple factors on entrepreneurship. However, entrepreneurship is a complex phenomenon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culture, institutions, etc.). Ignoring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multiple factors leads to inconsistent findings in previous studies. Therefore, analyzing the configurational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 on entrepreneurship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will help understand entrepreneurship deeply. In addition,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carried out abundant studies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but pays less attention to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activity.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r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may not influence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Therefo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ing the configurational effect of multiple factors on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will help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The eclectic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regards entrepreneurship as the synergistic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and focuses on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multiple factors. This theory provide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covering demand-side, supply-side, culture, and other elements for the analysis of entrepreneurship. Although previous studies used the eclectic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s focused on the net effect of a single factor. They could not effectively analyze the linkage effect of multiple factors. Th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can effectively analyze the configuration effect of multiple factors and is thus suitable for exploring the configuration effect of multiple factors of eclectic theory on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refore, taking 32 countries deriving from 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database from 2015 to 2017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his article employed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to test the configurational effects of six factors from the demand side, the supply side, and culture.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driving mechanism for generating high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includes four

configurations: supportive culture path, supply-side path, demand-supply-culture matching path, all-factors path. Second, the driving mechanism for generating high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consists of four configurations, which can be further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Human capital path, demand-supply matching path, demand-supply-culture matching path. Third,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figuration of high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high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Even in the absence of other conditions, high-quality human capital can produce high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but it is not enough to stimulate high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Only in a society with high social desirabi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that respects and recognizes entrepreneurship can high-quality human capital produce high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This study has thre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 this study uses the QCA method to analyze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ship by integrating six conditions under demand-side, supply-side, and culture, which explains the inconsistent findings of previous studies. Seco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figuration effect of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cultural factors,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which enriches the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of culture. Third,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which helps to enhance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entrepreneurship.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Fir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hange the concept of entrepreneurship policymaking from focusing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o concentrating on both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Second, in order to improve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it is still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enhance th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and cultivate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Finall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ntrepreneurship quality, policymakers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publicity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create an excellent entrepreneurial atmosphere (social desirabi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ly supportive culture.

This study has several limitations. First, due to the aim to analyze macro-level factors and limited data availability, this study on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upply-side, demand-side, and cultural factors on entrepreneurship. Future research can include more factors of eclectic theory to explore entrepreneurship. Second, this study failed to make an in-depth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ase. Future research can carry out in-depth case studies to reveal the internal process of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on entrepreneurship. Finally, this study i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hich fails to investigate the time effect of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on entrepreneurship. Future research can build panel data to analyze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effects over time.

Key Words: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entrepreneurial quality;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causal complexity; configurational effect